

发展混合所有制 前提是公权力退出市场

■ 丁是钉 张本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破解了非公有资本进入特定领域的难题,同时也破解了国有经济缺乏活力的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实现双赢的妙招。

从现实来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如何进入国有经济领域的问题,而国有经济进入非国有制经济几乎不存在更多的障碍。比如,中粮集团入主蒙牛就是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路径进入民营企业的典型案例。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国有经济领域,有三个层面的问题:能不能进;敢不敢进;想不想进。

三中全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突破,从理论和政策上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能不能进”的问题。尽管多年以来,国家对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常重视,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但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阻碍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存在“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条块分割”的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影响外,妖魔化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问题十分突出。

在现实中,一些部门和个人习惯于对民营企业进行有罪推定,经常把民营企业挂上负面的标签。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在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不规范操作被“找后账”的案例,更

“
产权保护制度一直是众多民营企业心中的痛,也是导致近年来大量“财富人群”外流的重要原因。只有公权力彻底退出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公有制经济“敢不敢进”的问题。

是让许多国有企业对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心有余悸。许多国有企业在寻找融资合作中都有这样一个优先次序:中央企业、世界 500 强企业、地方国有企业、非 500 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而有些干脆就把民营企业排斥在合作范畴之外。这些国有企业的理论是:和央企合作赚与赔都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风险;和世界 500 强企业合作风光有面子;和民营企业合作赚了没荣誉亏了有风险。三中全会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大突破,可以给那些原本对民营企业心存疑虑的国有企业吃一颗“定心丸”。

只有公权力彻底退出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公有制经济“敢不敢进”的问题。产权保护制度一直是众多民营企业心中的痛,也是导致近年来大量“财富人群”外流的重要原因。在以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财产纠纷的案例中,民营企业最终赢了官司又赢钱的案例占比非

常之少。一方面,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背景下,政府干预司法的现象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在司法系统中也存在着国有经济更优越的意识,从“理智”上不想触犯国有经济的利益。

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因绝对控股,依然可能对处于小股东地位的民营资本造成利益上的侵害。而政府系统和司法系统中长期存在的国有资本“老大”观念,更会对司法公平造成负面影响。因此,非公有制产权和国有产权的事实公平,还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只有民营资本更多、更快地进入国有经济,这个过程才可能缩短。同时,政府减少或退出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干预是实现产权公平的重要前提。

先进入者的财富效应和榜样效应,对于非公有制资本“想不想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其说民营资本对进入那些国有经济领域充满着渴望,不如说民营资本更想进入那些能够轻松“赚钱”的领域。和民营企业的想法形成反差的是,最先能够对民营资本开放的一定是那些国有资本不赚钱,甚至是遇到麻烦的领域。过去的事例表明,民营资本有能力在国有资本赔钱的项目上捞到真金和白银,但在这些行业开始有利可图后,国有资本可能会采取各种方法“收复失地”。

民营资本以小股东身份进入国有企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按照国有企业的游戏规则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其对于内部人控制的问题、能不能适应国有体制的问题都有着非常严重的担忧。只有让那些先期进入国有经济的民营资本赚到钱,并且是超乎其想象的钱,才会对更多的民营资本产生影响力和号召力,增加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和经营的积极性。

混合所有制对于改变国有经济内部的形态和体制将会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改变,不仅会促进中国经济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也会从深层次上改变人们意识中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差别的认知,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

深化改革应重视企业界的“摸石者”

■ 任斯理

“
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稳定是前提,发展是要求,改革是路径。要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既需要胆子大,也需要步子稳,更需要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胆子大”主要体现在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摸着石头过河,以此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步子稳”则说明要心中有底气,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做支撑。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

众所周知,“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用生动的比喻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探索方式的一种形象说法,使人们易于掌握,是老一辈革命家智慧的结晶。可以看到,正是遵循这种探索方式,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随着中国逐渐进入改革深水区,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风险由

“
“摸着石头过河”提了这么多年,谁才是真正的“摸石者”?我们的领导人当之无愧是中国深化改革的设计者,而中国企业家群体则承担着经济领域“摸石者”的角色,尤其是在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这种角色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可以摸到的“石头”变为难以觉察到的“暗礁”。这种仅凭胆识敢闯敢干的探路方式,已难以满足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过时了,恰恰是依靠这种精神,才能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而对于“顶层设计”,也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近年来改革之所以困难,仅仅是因为没有搞好顶层设计,只要有了好的顶层设计,全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显然也是错误的。顶层设计的基础应该是来自于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是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实践—信息反

馈—顶层设计—实践”的过程。而实践的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所以,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符合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思想,是富有先进性和创造力的体现。

实际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及国务院国资委将要出台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这些顶层设计都是来自于企业一线,来自于地方国企改革探路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既然本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作用,那么,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摸石者”的作用就更

加不容忽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够被称之为“摸石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是分享别人探路的红利。只有那些本人是创业领袖,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的企业也都在为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为增强中国创业者的信心而努力开拓进取,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之为企业界的“摸石者”,譬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

中国对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艰难中前行,在曲折中前进。对于市场经济这条道路的探索,如果政府完全走在企业前面,这条道路也未必适合企业。要想走通、走顺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既需要企业界的“摸石者”在艰难探索的基础上反馈顶层设计,也需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为这些“摸石者”营造出更适合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以此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承担“摸石者”这一角色。

当年,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正是依靠战略转移的“顶层设计”与红军万里长征相结合;如今,在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要想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就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家的作用,需要更多的企业家成为市场经济的“摸石者”。

《中国企业家报》:如何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界的作用?

王振耀:中国社会企业刚刚兴起,在探索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社会企业文化缺失的原因,也有企业资金困难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政府政策扶持不足,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影响了社会企业的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社会企业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理顺宏观政策,在体制上取得突破,同时借鉴国外经验,形成跨部门的合作机制,打造社会企业文化,努力塑造社会企业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充分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善能量,释放社会创新的活力,让有理想的社会企业家大量涌现,使社会企业运行更有效率。

企业拒经济普查另有隐情: 不愿为注水数据“摆拍”

(上接第一版)

上述工作人员坦言,之所以要求企业上浮数据,是因为希望“数据更加漂亮”。

“每次经济普查,都希望比上次有一定进步,而且希望进步越大越好。但实际效果达不到,相关部门又不能直接乱编个数据报上去,所以只能让企业上报注水数据。”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很多企业都被要求这样做,而且有的企业被要求上浮的程度比较大,甚至会达到 10 倍。企业肯定不愿意,但这数据又必须形成。所以如果单个部门操作效果不好,就会让其他主管部门一起‘帮忙’,最终数据也会报上来。”

在河北省另一个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口中,记者得到了类似的回答:“经济普查中,确实有一些企业被要求上浮数据后再上报。”

这样的做法招致企业不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向记者表示:“虽然主管部门跟我们承诺,所报数据跟税收等方面不挂钩,但报上去的毕竟不是真实数据,谁知道会不会出问题?现在不出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中央不是说了吗,不能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在我看来,就是不能简单以经济数据论英雄,而这样有水分的数据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数据已成包袱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时还发现,被要求上浮数据的对象以中小企业为主,而有规模、有影响力的企业往往能顶住“压力”,上报真实数据。

河北省某县一位经营农业和矿产的私营企业主告诉记者:“我们年产值在 2 亿元以上,2013 年对外投资过亿元。而我们不会满足于现状,要向大型化、规范化和集团化发展,必须上报真实数据。在本县范围内,企业无论从规模还是缴税方面都是比较大的,在经济数据贡献方面本来就不小,所以也就不再用再上浮了。”

直属于某央企、位于河北省的某国企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此次经济普查还没有给我们开过会,但上报的数据肯定不会有水分,因为我们年产值超过 20 亿元,这是硬碰硬的数据,没有再掺水分的必要。同时,我们的数据不仅要报给地方主管部门,还要受上级监管,肯定不能跟事实有出入。”

谈到此现象的原因,上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大型企业无论是为了现在的经营还是以后的发展,都会呈报真实数据,所以上浮数据的工作,主要由中小企业来完成。

河北省某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统计数据造假实属无奈。经济普查每 5 年一次,到现在是第三次,由于以前工作不严谨、监管不严格,造成了之前的数据就有水分。“别的地方我不了解,以我们县为例,作为一个贫困县,我们一直想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但毕竟底子薄发展慢,到了汇报的时候谁也不想自己数据不好看,所以就只能让下面把数据上浮后再报上来。”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这样年复一年的积累,使得历史数据变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包袱,经济建设不可能凭空突然爆发,虽然一直有所增长但也无法把之前数据中的水分消化掉,包袱只能一直背着。

“今年《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 7.5%,但省里给市里下达的任务指标要高于这个数值,到了县里,任务指标就已经超过了 10%。虽然中央已明确表示改变考核方式,但 GDP 还是当地领导干部的重要考核指标。”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三令五申难改注水现实

关于此次经济普查,中央有过非常明确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要求,这次普查最根本、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普查数据必须客观真实、全面准确、可靠可信,绝不能带水分,更不能弄虚作假。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在对经济普查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时也强调,要坚决查处普查数据上弄虚作假行为,对于任何在普查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不管涉及什么地方、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对典型案件要予以通报曝光。

企业上报数据由主管部门“安排”的现象已成顽疾。某地统计局负责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的干预之手,直接伸向了源头。而天津市一位统计部门专业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向企业“游说”,或变相施压,是企业不上报真实数据的原因之一。

上述专业人士说,统计数据具有连续性,不能突然出现的大的偏差。对基层企业统计数据的调整,大多通过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上级主管部门,对其所属企业中规模较大的个别企业进行调整。更加隐秘的做法是,由统计部门帮助测算,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与企业落实,让企业按照测算结果上报。

另一种方式就是重复上报。他说,“比如某集团下属独立法人上报一次数据,然后集团再将已上报过的数据汇总,以集团的名义再上报一次。”

【链接】

关于经济普查

经济普查是指为了全面掌握我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等情况,建立健全基本单位名录库及其数据库系统,为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奠定基础所进行的全面性调查。经济普查每 5 年进行一次,标准时点为普查年份的 12 月 31 日。除 2004 年条例发布,第一次经济普查为 2004 年外,以后逢 3 和逢 8 年份为经济普查年。

访谈

社会企业发展应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 本报记者 蔡敏 何秋红

当今世界正迈向一个全球公民意识兴起、国际公民社会重构的时代。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正在从强经济转向善经济,并以持续的变革行动影响世界。

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特色的社会企业、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创新?对此,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前司长、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企业报》:请分析一下慈善公益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王振耀: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快速的创新进程中,这个进程会形成一个以慈善为载体的广泛持久的潮流,

必将全面提升我们中国社会。当然,一定要在开放的格局中才能发展,如果封闭社会创新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要重新定位我们的社会创新,要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国际对话的进程当中,思考和汲取国际经验。目前,中国因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经受着一个净化。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慈善公益引进市场机制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社会创新的大门可以说是刚刚打开一道缝。我们有这种急需开发的丰富宝藏,我们的机会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大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学习,能否善于调整我们自己。

《中国企业报》:请谈谈什么是社会企业?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状况如何?

王振耀:概括而言,社会企业就是其投资主要用于企业本身或者社会。与一般其他私有企业不同的是,它不只是为了股东或者企业的拥有者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运作。社会企业具有善经济的特质,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企业家,首先要有社会使命感,同时还要有商业经营的概念。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来自西方,但中国儒商强调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中就有向社会企业转化的要素;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 30 多年的改革实践,也在无意中做了许多鼓励社会企业发展性质的伟大事情,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政府造血式的扶贫政策以及对大量环保、民政福利企业、民非机构和农业项目采取减免税的扶持政策。